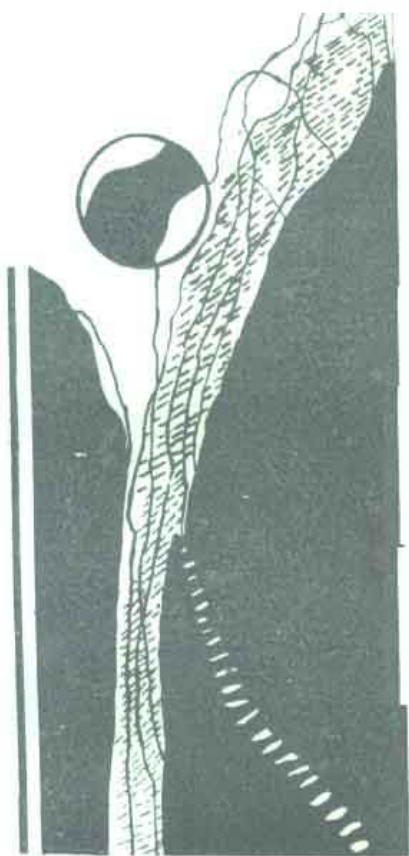


臨安文史

第三輯



临安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主 审

潘庆平 楼建昌

初审兼编辑

许扬本

政协临安县文史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写在前面

《临安文史》第二辑出版后，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与关注，不仅县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谬加称赏，其影响甚至远达海外，如香港知名人士明报集团负责人查良鏞先生（即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曾致函本辑编者说：“文史编集，具见功力”，表示“读后极感兴趣”。更可感的，是不少热心读者对该辑所刊“抗日时期临安大事记”一文中的某些讹误提出补正，编者已汇成专文（见第三辑“编后”），俾史料益臻翔实。

现在，《临安文史》第三辑行将问世，这辑在内容与编排上均有所创新，全书凡十二万余字，共收专稿32篇，分为五个专栏：即“历史名人在临安”、“天目春秋”、“解放前后”、“教坛记事”、“胜迹流连”等，各具特色。其中有些文章颇富学术价值，如“苏轼在临安的行踪和诗作考析”、“太平军临入（安）考”等；有的史料则系新近发掘，如“蔡元培在临安”、“蒋介石天目之行”等。我们认为：衡量一本书的价值，关键在于质量，尤其是文史资料，必须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

本刊同人的态度一如既往，欢迎广大读者对本辑文史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办得更好。

编者

目 录

写在前面.....编者

历史名人在临安

苏轼在临安的行踪和诗作考析.....蔡 涉 (1)

蔡元培在临安.....许扬本 (10)

蒋介石到天目山情况的调查.....胡月耕 (15)

照片：蒋介石在天目山..... (16)

蒋介石“避寿”到天目.....王文彬 (19)

再谈钱镠.....许扬本 (23)

照片：临安钱镠墓..... (27)

郁达夫先生游临安诗二首..... (26)

天 目 春 秋

太平军入临(安)考.....许扬本 (27)

红军在昌化的历史性影响.....李振华 (34)

中美友谊的新篇章.....叶全民 (39)

照片：在一号机坠落处的美方考察团..... (42)

我爷爷被北佬杀害的经过.....潘庆平 (44)

记张雷烈士.....吴西震 顾彭荣 (48)

沈奇其人.....朱传德 (52)

源远流长话香粉.....周之瑶 唐天华 (57)

补白：抗日时期两个“侨寄”临安的县政府

.....扬 本 (33)

余杭挑盐·····	章迎正 (61)
-----------	------------

解 放 前 后

山城惊雷·····	王 灵整理 (64)
回忆昌化青训班·····	周 易等 (74)
於潜“六·二八”事件·····	杨一平 (81)
回忆参加天目大队与临安解放前后的岁月 ·····	卢汉华 (88)
1949年临安剿匪概述·····	汪 槐 (93)
抗美援朝中的临安农村·····	楼建昌 (101)
临安最早的初级农业社·····	卞良根 (104)
民国时期临安两次特大的自然灾害 ·····	楼建昌 吴西震 (108)
解放前昌化的自给经济·····	章迎正 (110)
抢救“七·五”洪灾记实·····	杨一平 (115)
一位为支援昌化解放而牺牲的中医——周秩宗 ·····	章敦仪 梅 发 (120)
补白：词 浣溪沙·咏苕溪水利工程·····	扬本 (122)
杨立贝其人其事·····	王天一 (123)
“石室寺”真相初探·····	扬本整理 (133)

教 坛 记 事

我县第一所中学的诞生·····	程小戎 汪 澜 (135)
照片：昌化中学奠基碑·····	(137)
记金文韶先生·····	刘宝仁整理 (142)
临安工农中学琐记·····	刘宝仁 牟 琴 孙宗让 (151)

胜迹流连

临安的古塔.....	王建华 (158)
照片：普庆寺石塔.....	(159)
临安的吴越文物和遗迹.....	李之川 (164)
玲珑山胜景记略.....	杨一平 (173)
编后：读者关于《抗日时期临安大事记》的来信及其它	编者 (178)

苏轼在临安的行踪和诗作考析

蔡 涉

北宋大诗人苏轼在北宋熙宁、元祐年间两度仕杭，先后出任通判、知州。在此期间，他多次循行属县，来到临安、於潜、昌化，以及邻县新城一带，观政问俗，体察民情，了解农事，并且留下了不少诗篇。“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概括了他当时的心境和行止，而使他卷入“乌台诗案”的某些诗篇有不少也创作于此时。

(一)

从《苏轼诗集》和地方志籍中初步汇集，苏轼在临安写景记事咏物言志的诗作共有40首。其中，熙宁39首，元祐1首；已入集39首，未入集1首。

参考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按苏诗编年辨析，苏轼初度倅杭，是自熙宁四年十一月至熙宁七年九月（36至39岁）。这期间，他曾到临安四次，於潜两次，昌化一次；登径山两次，并先后登玲珑、九仙、西菩诸山，并有诗作。

到临安四次：第一次是熙宁五年（1072）七月间，自余杭（今余杭镇）来，有诗《宿临安净土寺》“鸡鸣发余杭，到寺已亭午”可证。临安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故里，苏轼这次来凭吊此地，在他留下的两首五古中，有“明朝入山房，石镜炯当路。昔照熊虎姿，今为猿鸟顾。”“缅怀异姓王，

负担此乡县。”“谁谓山石顽，识此希世彦。凛然英气逼，屹起犹耸战。他年万骑归，父老恣欢宴。锦绣被原野，金珠散贫贱”的记叙，并以窦融、吴芮旧事，哀叹荣华消失，惟余深殿中幽暗的长明灯而已。据所述之景，可知苏轼那次“步至”石镜山、功臣山、钱坞垄、锦桥一带，今两寺均圯，但方位准确。后去径山，必经县治。那时临安县知县是陈师锡，据乾隆《临安县志》载：建阳人，有善政，苏轼荐于朝。游径山有诗：“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鞍玉镫再回旋。……”气势磅礴。

第二次是熙宁六年（1073）五月间，从於潜返杭，途经临安，逗留县治，当时知县是苏舜举。《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中的“宗人”即指苏舜举。诗中说，“与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叶空残绿。如今莫问老与少，儿子森森如立竹”，看来这是一次家宴，地点应在临安治所高陆。苏舜举子嗣甚众，有所谓“八丈夫”不忧“归耕”之说，苏诗末句即指此。

第三次是熙宁六年（1073）九月初，“往诸县提点，到临安县，隔得一两日，周邠、李行中二人亦来，与轼同游径山”。他先至临安，巡行约三日，“篮舆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旷平”。到过玲珑、九仙、西墅等地，亦有叙述吴越钱氏的诗如《临安三绝》、《陌上花》等。所乘“篮舆”是一种竹制的便轿，但又不同于滑竿，四壁篾编，两侧有窗，半截门帘，横搁木板，可置纸笔，即另一首诗中写的“篮舆置纸笔，得句轻千乘”。这次到临安，“有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来本县界外太平寺相接”，后同去径山。《再游径山》与上次诗成姐妹篇，同为七言古风。28句196字，似非作者无意中偶合；还有五古三首。《径山道中……》“南望功臣山，云外盘飞磴。三更渡锦水，再宿留石镜。”“玲珑苦奇秀，名

实巧相称。九仙更幽绝，笑语千山应。”从临安一侧登径山，景观历历在目，写来凿凿有据。“老人登山汗如濯”，此次巡行疲乏，“九月八日自径山归”，“以病”“屡不赴会”。

第四次是熙宁七年（1074），据苏轼《跋蔡君谟书海会寺记》：“熙宁甲寅，轼自杭来临安，君谟没已六年矣。”同时，作《海会寺清心堂》诗（？）。

有据可考的就这几次，其他可能还来过，如《洞霄宫》“作者七人相对闲”，据查慎行注：东坡侔杭时，同蔡准、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凡七人来，为林泉之游，遂名其岩曰“来贤”。因此也进入临安县境。

到於潜两次：第一次是熙宁六年（1073）寒食以后，“杨柳初飞絮”时，经富阳、新城（新登镇）来於潜，有《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於潜僧绿筠轩》、《於潜女》等诗，说明到过岵嵒山、绿筠坪一带，即今於潜镇周围。“我来观政问风谣，皆云吠犬足生耗”，概括了当时知县刁瑋的政绩；“山人醉后铁冠落，溪女笑时银帟低”，反映了当地古朴淳厚的民风。此后又去昌化，折回临安返杭。从“蓬脊障前走风雨”、“乱山滴翠衣裘重”等先后迭见散发湿漉漉气氛的诗句，以及返杭后《五月十日……泛湖游北山》诗“三吴雨连月”，可见这年春季雨水特多。

第二次是熙宁七年（1074）八月下旬，亦经富阳、新城，二十五日经青牛岭（新城境），到浮云岭（於潜境），捕蝗至於潜。当时，知县刁瑋已于是年正二月间离任，由毛国华（君宝）继任。有七古长题《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於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羨君封境稻如云，蝗自识人人不识”，说他十五年来还是一个县官，但并非讥讽他是无能之辈。转据《於

潜县图经》：毛君宝，同尉方君武与东坡，于熙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同游西菩山明智院，石刻存焉。又据《咸淳·临安志》：熙宁七年八月，苏文忠公同毛君宝、方君武访参寥、辨才，遂宿西菩山，留题。说明他与毛君宝是乐于相处的。在西菩山留宿时写下的七律二首，是苏轼在杭任通判时的最后两首诗，也是有关临安的诗作中唯一有日期可考的。这也许应归功于道潜因慕苏而详刻于石，复载图经，转注诗集。现石刻、图经均无存，却借诗注得以传世。道潜，即参寥子，此后与苏友谊甚笃，多有唱和，“子瞻谪齐安，参寥不远二千里相从期年，子瞻谪南海，参寥欲泛海访之，子瞻以书戒止。”这次苏轼由於潜返杭，九月即离杭出知密州。

到昌化一次：即熙宁六年（1073）四月底五月初，正是“桑枝刺眼麦齐腰”的时节，是第一次来於潜时转道过去的，有诗《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有注引用徐冠（观）《新亭记》：“县治之前，溪分南北流，旧有双溪馆。”用语不够准确，读者容易误解。其实是溪中有洲，水分两注，故称双溪。据乾隆《昌化县志》载：“宋熙宁六年，县令陆元长临北流为亭，东坡经游其上，题诗记事，有‘双涧响空’之语。”昌化山景，仿佛眉州，“正似醴泉山下路”、“梦归时到锦江桥”，使宦游客居于外地的苏轼顿生思乡之情。

苏轼于十五年后再度守杭，自元祐四年七月至元祐六年三月（54至56岁）不足两年时间，有否重到过临安，没有诗作可考。此番帅杭任重，又致力于水利，“浚西湖，为长堤，修六井”，少有余暇巡行属县。但作为短暂度假性质，可能来过玲珑山，洞霄宫。据乾隆《临安县志》：“玲珑山，在县南十里，即苏子瞻、黄山谷、佛印胜游处。僧尝于寺基下得

三人遗像，明令褚栋立碑记之。山两峰屹峙，盘空而上，故曰玲珑。经石门，石偃卧如榻，镌‘醉眠石’三字，乃坡公笔，相传坡公醉时高卧枕流处。……稍上曰‘三休亭’，亭上石蹬蜿蜒，似灵鹫韬光，山径巨石矗峙，镌‘九折岩’三字，亦坡公笔。坡诗及古题咏皆刻于上。……再上数武，罗汉松一株大可合抱，坡公所植者，亦名‘学士松’。……转东有琴操墓，甃石鳞砌，许大颖建碑。”又据《西湖游览志余》：“苏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颇通佛书，解言辞，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戏语琴操曰：‘我作长老，汝试参禅。’琴操敬诺。……子瞻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言下大悟，遂削发为尼。”传说以后苏轼送她到玲珑山修行，卒葬于此。上述有关山谷、佛印、琴操数事，似应属苏轼元祐守杭时，再来过临安玲珑山是有可能的，但尚待进一步考证。

(二)

苏轼在临安的诗作，有不少涉及“讥讽时政”，被列入“乌台诗案”的内容之中。分析他写这类诗的原因，既有作者的自我意识、政治背景等基本因素，也与临安地域条件、人事关系等原因有关。

一、从作者自我意识上分析。苏轼是个有相当抱负的人，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一岁中进士，入仕途后，十年中两逢丁忧，到熙宁元年他三十二岁才真正出山，很有点恃才图进的心理。在朝遇挫，初放外任，到杭州、来临安时，也不过三十五六，血气方刚，充满着反挫折、反压抑的情绪，必然要寻求发泄点。他祖辈“布衣”、“寒族”、“世农”，对山村农民有相当感情，乐于深入下层，了解农事，

重于体恤民情，关心疾苦。加之秉性豪放旷达，属外向型性格，以诗言志，或直抒胸臆，或借题发挥，反映了他当时的思绪，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流露。

二、从当时政治背景上分析。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变法。新法有其打击豪强，富国强兵，励精图治的历史进步意义，也有其不够完善，骤进划一，不利于民的失误方面，再加上贯彻时也可能层层走样，唯利是求，而遭民怨。苏轼和王安石政见不合，到熙宁四年更趋激化，终至乞补外任。原拟知州差遣，后改通判杭州，当然抱有不满情绪，到地方上以后，对新法弊端看得较多一些也是事实，但在态度上却始终光明正大，凡有所陈述，直言不讳，从来未做过任何小动作。

三、从临安地域条件上看。临安山区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发迹之地，吴越在五代乱世能坚持“保境安民”的国策，还是颇得民心的，临安时称“衣锦军”，乃后方腹地重镇，更为稳定。到北宋统一中国，钱俶纳土入朝，而“昌化百年，民知易姓，不知易国”，再加上山区闭锁，骤行新法，尤感抵触。苏轼对吴越钱氏的业绩颇为肯定，从《表忠观记》可见；他到临安写的诗作涉及钱氏的就达11首。“至今遗民悲故主”，当地人民对往昔的眷恋，对新法的抵触，当然也会在苏轼的即事诗中得到更多共鸣。

四、从当地人事关系上看。原临安及周围几个县的地方长官，和苏轼都是同年好友。临安知县是他“宗人同年”苏舜举，於潜知县也是“同年”刁琬，罢任后还有交往；继任的毛国华，也是他老师梅圣俞生前诗作中的“毛长官”，附近的新城知县晁端有，亦属友好，颇受他敬重，誉之为“乱山深处长官清”（其子晁补之也深受他的赏识，是苏门学士之

一)。他们在政治见解、文学主张上非常接近。“诗逢知己意更真。”在这样的友谊氛围中，必然会让真情实感毫无保留地充分流露于酬唱之中，达到了“数诗狂语不须删”的程度。

因此，以苏轼的自我意识，处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加上某些外因催化，写出这些讥讽时政的诗确有其必然性。当苏轼离京赴杭上任时，他的表兄文同《送行》诗中曾关照过“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耿直的秉性难以逆转，《初到杭州寄子由》就发出了“眼看时事力难尽，贪恋君恩退未能”的感慨。第一次至临安，《游径山》有句：“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宽处差安便”，此种情绪已遭物议。

到第一次从新城至於潜，所写《山村五绝》更是系统阐述了自己对时政的看法（按：光绪《於潜县志》“柱石山”条内载有此诗）。某选本注认为“山村在新城”，当从《新城道中》推测而来，这里“山村”似应以泛指於潜、新城一带为更妥，因诗的内容是数述途中所见，并非专指某地。例如，“无象太平还有象”，“有生无处不安生”，“迩来三月食无盐”，“过眼青钱转手空”等句，反映当时盐法太峻，民食无盐；青苗敛钱，米贱伤农，都是一般状况。参照他写的《吴中田妇叹》“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连鱼米之乡的“吴中”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临安一带的“山村”了，这些诗，真切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际，直率地呼喊出农民的疾苦，酸辛中饱含讽刺的意味，因而遭当局的疑忌。他第二次来临安游径山，苏舜举到本县界外相接时，曾告诉他草拟了一份简便的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却被训狐押出”；还讲了一个燕子蝙蝠为分辨旦夕争而不决，诉之凤凰却被“训狐”擅权难辨是非的寓言。他把这些内容引入

诗中，作《径山道中……》：“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初读似是信手拈来的游戏之笔，实则隐寓对当时朋党之争扰扰不休的厌恶之情。

面对人民疾苦的现实和朋辈影响，苏轼最后一次捕蝗到於潜时所写的五首诗，几乎篇篇有牢骚。如《捕蝗至浮云岭……》“新法清平那有此”、“回首人间忧患长”；《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却遭明主放还山”、“蝗自识人人不识”；《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推挤不去已三年，鱼鸟依然笑我顽”……。从始来时的“江神见怪警我顽”，到临走时的“鱼鸟依然笑我顽”，前后贯穿了一个“顽”字，顽在耿直不变。正是这些诗被李定、舒亶罗织罪名，诬陷打击，使他陷进“乌台诗案”，在御史台狱关了一百三十天。他在《……遣子由二首》诗中说“是处青山可埋骨”、“桐乡知葬浙江西”，自度不得活了，连将死都还恋着“浙西”这片土地。

其实，就苏轼本人而言，开始在要求改革问题上和王安石并无重大分歧。苏轼在早期就做过大量调查研究，发表过一系列改革弊政的言论。当时区别在于王重变法而争速，苏重治平而求稳。他在《往富阳、新城……》诗“世上小儿夸疾走”就点出其症结。带有欲速不达的讽喻。这也是他深入下层，体恤民情，更多地从人民的承受能力来考虑的。如果王安石他们能大度容人，取长补短，团结象苏轼那样主张改革而在策略上有所不同的人，也许新法的推行就能够顺利一些，效果也好一些。到元祐年司马光重新上台，废除全部新法；这时，苏轼又主张“参用所长”“不可尽改”，可见苏轼一直不欲纠缠于朋党纷争之中，而从强国恤民出发，以光明磊落的态度陈述自己的政见，并不考虑个人的亲疏得失。然而在当时朋党倾轧愈演愈烈的情势下，象他这种待人刚正、处

事耿直的人，新旧党都不能容，反遭左右夹击，以致仕途失意，一生坎坷。

有人认为“乌台诗案”是苏轼政治生活和创作思想的分水岭，以前是奋发进取的，以后是旷达恬淡的。这也不尽然，苏轼的思想体系是较为复杂的，他读经史而尊儒，学老庄而近道，亲僧释而崇佛，往往进取意识和退隐心理交织在一起，在进取中流露退隐，在挫折中向往奋进。正是这种矛盾状态构成了苏轼的人物个性和创作特色。这是一种实实在在、活活泼泼的个性特色。在他的诗作中经常笔锋一转而情绪跌宕。这种状况，即使在他的早期诗作中也有，在临安的诗作中更不少见。就看首度倅杭时的诗，诸如“兴废何足吊，万古一仰俯”、“荣华坐销歇，阅世如邮传”、“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静”、“嗟予老矣百事废，欲看细字销残年”、“窃禄忘归我自羞”、“倦飞不拟控扶摇”、“老尽世人非我独”、“已外浮名更外身”、“杀马毁车从此逝”、“更欲洞霄为隐吏”等等，几乎占临安诗作中的三分之一。写出上述诗句时，作者只有三十多岁。又像他在《登玲珑山》这首七律中写道：“何年僵立两苍龙，瘦脊盘盘尚倚空。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透碧玲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可是笔锋一转，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结束，矛盾而协调，阐发的哲理可以从消极理解，也可以从积极理解，有限身，无限事，是勇退还是勇进？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的主导方面也会转化，在他二千多首诗作中的最后一首，《答径山琳长老》（居然还和临安有关），其中“大患缘有身，无身即无疾”，已完全近于“色即是空”的佛学思想了。这是他历尽坎坷人生的最后一瞬曝光，当然是“苏轼式”的曝光。

蔡元培在临安

——记蔡元培和许香九的一段交往

许扬本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和秋瑾等所创建的光复会，与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同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同盟会的组建基础。蔡又是杰出的思想家与教育家，早在清末翰林院任编修时，就同情康梁的变法维新，有“当代龚定庵”^{注1}之称。民国成立后，在北大校长任内，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讨论自由，聘请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乃至辜鸿铭等不同观点的学者任教，这在当时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对五四运动的兴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蔡元培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考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应散馆考试，授职翰林院编修。科第出身与翰苑编修，是当时所谓的“清贵之品”，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顶峰，内自殿阁学士，外至督抚重臣，大都要经过这一阶梯，可是蔡先生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目睹戊戌变法维新的失败，认识到清皇朝的政治改革已“无可希望”，毅然于同年9月1日弃职出都，南下兴办教育，从事革命活动，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大约在1901年春天，蔡元培偕童亦韩先生来临安，到高陆（今高乐）访许香九，畅谈甚洽。归去后即写《赠许香九》

一文，文末注明为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廿四日，即1901年4月12日。并在许香九谈话的触动下，萌发了为旅临越郡同乡子弟创办一所小学的念头——旋即筹建了启明小学，为临安最早的一所学校。

许香九注²是我的大爷爷（爷爷系祖父之俗称，即我祖父的亲长兄）。我家祖籍绍兴府山阴县，曾祖许思涓，和蔡同县，著有《秋水轩尺牍》一书，驰名幕府，蔡当然是知道的，但蔡并不认识我祖父。《赠许香九》一文，其意义不仅仅记述了个人之间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对当时社会弊害之忧愤与重视教育走向革命的由来。

以下扼要介绍《赠许香九》一文的主要内容并略作析述。

全文约九百字左右。第一段为总起，以“隐者”为喻，说隐士分为畸隐与侠隐两类，前者屏绝世缘，甘作废物，后者和光同尘，实际上是有所作为的，暗示下文所说的许香九就是属于第二类的，这是全文的起“兴”。

第二段是说访问许香九的原因以及对许的印象。当时旅居临安的越郡同乡虽多，但城居的“业胥吏”而“黠猾”，

“农于乡”的虽“愿恣可倚任”，又“率不解事”，没有可以深谈的。友人童省庵给他介绍北乡高陆的许香九，“课农圃，授子弟经史，足迹不入城市。”于是携了童省庵的介绍信，和童亦韩一起到高陆去访许香九，彼此纵谈了临安当时人物风习，相识恨晚，才知道许香九也是一个忧时伤国的有心人。

第三段记述了许香九所谈的几点具体内容，其中有一件是许决心兴学的事，以“所营室为学塾，将招乡人子弟读书其中”，不仅如此，又要以所营室“为讲堂”，“将以月之朔（初一）、望（十五），讲圣谕广训，以旬之三、八，讲经史大义，使乡之中，老弱壮俊皆环而听焉，庶以益于风俗”。